

【東亞伊斯蘭研究叢書】總序

徘徊於熟悉與陌生之間的鄰人： 伊斯蘭教在東亞

因為種種原因，華文學界在東亞伊斯蘭教（尤其東北亞）的研究尚未成熟發展。當前伊斯蘭信徒佔全球人口20%，更有增加的趨勢；而在過去二十年，全球人口流動人口流動的密度已達歷史高峰，生活於非穆斯林國家的穆斯林數量乃日益增長。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伊斯蘭受到世界媒體和學界的熱切關注，有關東亞伊斯蘭教的研究，亦自跟從這一潮流而漸次興起。歐美學界對東亞伊斯蘭的系統性理解最早起源於歐洲傳教士。與作為前輩的耶穌會一樣，中國內陸宣教會（Inland China Mission）在十九世紀中葉「也積極地在研究中國的穆斯林，其目地當是對穆斯林宣教做準備。」¹現代的伊斯蘭教研究自然不同被賦予這種宗教殖民或是判教的色彩，而是期望以客觀的角度釐清現象。伊斯蘭在東亞具超過一千年的歷史，但卻在華文（及其他東北亞國家）的論述中欠缺了適當的位置。當「伊斯蘭」與「恐怖主義」、「難民」等概念被習慣性地劃上不當等號時，伊斯蘭教與穆斯林便如大都市的鄰里，徘徊於熟悉與陌生之間。這一種忽視，足以

¹ 林長寬主編：《伊斯蘭在地化：中國伊斯蘭發展之探討》（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2015），頁xv。

令我們對今天世界局勢的理解。

在東南亞，伊斯蘭教可說是主要宗教。十三世紀之後，來自西亞與北非的穆斯林商人漸次將伊斯蘭教帶入東南亞的島國。到了十六世紀歐洲人東航至當地，馬來亞與印度尼西亞已經有大量的穆斯林人口。今天印尼穆斯林是世界上具有最大穆斯林人口數量的現代國家。雖然印度支那半島居民主要信奉傳自南亞的印度教與佛教，泰國、柬埔寨、緬甸地區亦有不少穆斯林居民。有關歷史上和現代的東南亞伊斯蘭教，學界早已多有研究。² 往北觀察，在一般來說被認為是中華文明中心的華南與華中，其實亦散落著不少被紀錄為「回回」或「回民」穆斯林。在兩廣、福建等沿海地區，穆斯林在十三世紀蒙古治下多有參與海上貿易，更曾因政府內部鬥爭與遜尼、什葉派之間的鬥爭而引發長年戰亂，割據一方；³ 除了青海、寧夏、甘肅、陝西等因毗鄰中亞穆斯林

² 有關近年簡介東南亞伊斯蘭信仰的作品，可參Hussin Mutalib, *Islam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8); Hui Yew-Foong, *Encountering Islam: The Politics of Religious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3); Joseph Chinyong Liow 與 Nadirsyah Hosen 於2010年出版的四卷本論文集，集合了不同學者於東南亞穆斯林於歷史、文化、身份認知、政治、公民社會、全球化及恐怖主義的研究，值得讀者參考。見Joseph Chinyong Liow and Nadirsyah Hosen eds., *Islam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³ 有關近世福建穆斯林歷史，參張中復：〈從「蕃客」到「回族」：泉州地區穆斯林族群意識變遷的歷史省察〉，洪麗完主編：《國家與原住民：亞太地區族群歷史研究同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05），頁283-326；當地參與海上貿易最為著名的群體可數蒲壽庚（1245-1284）家族，莊為璣、莊景輝：〈泉州宋船香料與蒲家香業〉，收入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泉州市泉州歷史研究會編《泉州伊斯蘭教研究論文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頁227-238；當地穆斯林在十四世紀的衝突，參陳達生：〈泉州伊斯蘭教派與元末亦思巴奚戰亂性質試探〉，收入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

群體而具大量穆斯林的地區，華文傳統稱為中原的洛陽、開封等地，亦有各式穆斯林聚居過五百年。⁴ 由於各種的誤解，過去學

史博物館、泉州市泉州歷史研究會編《泉州伊斯蘭教研究論文選》，頁53-64；張忠君、蘭陳妍：〈也論元末亦思巴義戰亂的性質〉，《黔东南民族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3，期21(5)，頁22-23。有關近世福建穆斯林歷史，可參中元秀、馬建劍、馬逢達編：《廣州伊斯蘭古蹟研究》（銀川市：寧夏人民出版社，1989）；馬強著：《流動的精神社區——人類學視野下的廣州穆斯林哲瑪提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6）。至於其他南中國沿岸伊斯蘭群體史料，可以各地清真寺為中心探討，參考馬建劍、張菽暉編：《中國南方回族清真寺資料選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⁴ 有關帝國陸上邊境的穆斯林歷史，可參王伏平及王永亮以斷代形式及以「文化撞擊」、「護教與保族」、「謀生之路」、「念經與唸書」等分類編纂的簡明敘述，見王伏平、王永亮著：《西北地區回族史綱》（銀川市：寧夏人民出版社，2003）；較為關於同一時期的重要作品，亦參James A.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及張中復：《清代西北回民事變：社會文化適應與民族認同的省思》（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帝國西南邊境穆斯林狀況的研究，則可參馬維良著：《雲南迴族歷史與文化研究》（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5）；近世「中原」的穆斯林群體則形成於忽必烈帝治下，「庚子（1281），括回回砲手散居他郡者，悉令赴南京屯田」，見宋濂等撰；楊家駱主編：《元史》（臺北：鼎文書局，1981），卷11，頁232；這裡的「南京」指「南京路」，《新元史》載「汴梁路。上。宋開封府，為東京，屬京畿路。金為南京，屬南京路。太宗五年，崔立以南京降，仍為南京路。至元二十五年（1288），改汴梁路。」見柯紹忞：《新元史》（上海：開明書店，1935），卷47，頁118-120；南京路約指後來河南省所在地，因屯田而定居的穆斯林軍人與家眷成為了帝制中國晚期當地的伊斯蘭群體的始祖。在後來明代《鄭州志》（嘉靖三十一年（1522）本），仍載「州城內有『回回巷』」及該地「回回群處」。在1841年的黃河決提中，當地穆斯林為了堵塞開封城的水門，拆下了過百年歷史的東大寺（清真寺）救民於難，道光帝遂親筆寫下「護國清真」的匾額，並下令重修東大寺。參王柯：《消失的「國民」：近代中國的「民族」話語與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頁47；亦參巴曉峰：《元明清以來河南清真寺的發展與變化——以周口、許昌、漯河三市為考察的

者經常誤認為大明與大清帝國長期實行「海禁」，但近十年的史學成果告訴我們，「海禁」祇不過是以國家的力量壟斷與管剩國際間的海上交流，而不同於禁絕一切異國事物於國門之外的「鎖國」。⁵ 比較華南、東南亞與歐洲的原始文獻，穆斯林即使在歐洲人主導東南亞海域的年代，仍然活躍於華南、東南亞與印度洋各地之間的貿易。⁶ 在較東的臺灣，穆斯林人口在二十世紀前鮮見於歷史紀錄之中，這可能是臺灣在荷蘭、明鄭政權、大清與日本帝國的時期確實與伊斯蘭世界的接觸有限，但也這可能是學者忽略了隱匿於文檔中的穆斯林。⁷ 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從中國移居臺灣的穆斯林計有二萬至六萬人，當中也包括了早已移居泰、緬而後遷至臺灣的雲南穆斯林，由於戰亂關係，人數未有精確統計，多於教內流傳。然而，現在的臺灣穆斯林群體也包括了從各國到臺的約十五萬旅居者，主要包括印尼及非洲各國的勞工及留學生，亦有少量從阿拉伯國家到臺經商的暫居者。⁸ 為了滿足日

重點》，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碩士論文，2011。

⁵ 上田信：《海と帝国》（東京：講談社，2005），頁101。

⁶ Hung Tak Wai, “After Diu: The Forgotten Islamic Trade 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Cantonese Confucian Historiography,” *Journal of Islam in Asia*, Vol.16, No.1: Special Issues: Islam in the China Seas (2019), pp.107-136.

⁷ 在日治時期以前，筆者所見的臺灣穆斯林的紀錄，祇有鹿港一地的兩個穆斯林家族傳說。參李昭容：《鹿港丁家大宅》（臺中市：晨星，2010）；賈福康《臺灣回教史》（新北：伊斯蘭文化服務社，2002）；莊景輝：《陳埭丁氏回族移民台灣的調查與研究》（香港：綠葉教育出版社，1997）；郭雅瑜：《歷史記憶與社群建構：以鹿港郭姓為例》，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⁸ 李松茂：《伊斯蘭教在台灣的發展與變遷》，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2002，頁1-2；有關現代臺灣穆斯林生活文化的研究並不豐富，多為人類學或民族學形式的研究，例子可參馬孝棋：《殯葬文化對宗教意識與族群認同的影響：以台灣北部地區穆斯林為例》，國立政治大學

益國際化的生活形態與經貿發展，臺灣近年亦安排了不少伊斯蘭友善的活動與措施，如「國際清真產品展」（International Halal Expo）、引入各種伊斯蘭節慶、承諾設立「清真驗證（halal-approved）餐廳」以及旅館中的伊斯蘭祈禱室等等。⁹ 雖然穆斯林在韓國的人口仍然稀罕，但同樣也推出類近措施。¹⁰

與傳統上被假定為單一文化體系的印象相異，由於「少子化」及勞動人口不足等問題，日本政府也在二十一世紀初已逐步引入外勞與研習生，安倍晉三政府更在2018年制定各項如人數上限與工作年期等細節，大舉向東南亞及南亞各國海外勞工招手，預計到2024年之前將引進34萬名外籍勞工。日本政府為整個計劃安排了11種語言與126項支援政策，亦為不少中小企業與過半數的國民所期待。¹¹ 日本引進外國勞工與學生的計劃的重要對象為

民族研究所學位論文，2010。

⁹ 〈相較許多國家有「伊斯蘭恐懼症」，台灣卻是張開雙臂歡迎伊斯蘭文化〉，《關鍵評論》，2018年12月14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119>，瀏覽於2020年5月4日。

¹⁰ Park Hyondo, "Islam and Its Challenges in Contemporary Korea Report," in *Globalization and the Ties that Bind: Korea and the Gulf*, edited by The Asa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of Middle East Institute and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Asa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2015), pp.40-50.

¹¹ 〈外国人材受け入れ、総合的対応策を年内策定〉，《日本經濟新聞》，2018年12月10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38747620Q8A211C1000000/>，瀏覽於2020年5月4日；〈外国人労働者、地域で11言語対応 支援策126項目決定〉，《日本經濟新聞》，2018年12月25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39331610V21C18A2MM0000/>，瀏覽於2020年5月4日；〈改正入管法で外国人材拡大 道内企業、人手確保に期待〉，《日本經濟新聞》，2018年12月21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39204570Q8A221C1L41000/>，瀏覽於2020年5月4日；〈外国人材拡大、「賛成」5割超す 高度人材に期待多く〉，《日本經濟新聞》，2018年12月20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

東南亞、南亞及西亞各國，當中不少國家都擁有龐大的穆斯林人口。因此，日本國內的穆斯林數目亦在過去十年增益甚多。在2014年，日本清真寺數目約為80所，至2018年，數字已增為105所。¹² 日本與伊斯蘭文明的因緣自然不止近年的經濟合作。早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已與伊斯蘭世界多有民間的聯絡。在1890年，以推行泛伊斯蘭主義聞名的鄂圖曼帝國的蘇丹和哈里發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II，1876 - 1909在位）就在1890首次遣使日本，過六百人的使團獲明治天皇（1867-1912在位）接見。自此，兩國開始了不少的小規模交流。至大正年間，由於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令鄂圖曼帝國與日本帝國有了同仇敵愾的感覺，伊斯蘭世界對日本有豐富的想像，兩國的官方與民間交流日益增多。不少日本思想家定義亞洲文明時，將伊斯蘭世界與自身視為一體。1920年岡倉天心（1862-1913）在倫敦出版《東洋的理想》（*The ideals of the East*）倡議「亞洲一體論」，就提出「阿拉伯的騎士道、波斯的詩歌、中國的倫理與印度的思想，都旨於一種古老的和平」。¹³ 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大川周明（1886-1957）等倡言的「聯合伊斯蘭論」及在華北成立的「防共回教同盟」等等，更將亞洲各地的伊斯蘭教力量，視為日本帝國與歐美各國抗衡的潛在力量。¹⁴ 事實上，日本早在二十世紀

39161710Z11C18A2TJ2000/，瀏覽於2020年5月4日。

¹² “No. of Muslims, mosques on the rise in Japan amid some misconceptions, prejudice,” in *The Mainichi*, November 29, 2019, accessed 4th May, 2020, <https://mainichi.jp/english/articles/20191128/p2a/00m/0fe/014000c>.

¹³ Kakuzo Okakura, *The ideals of the Eas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art of Japan* (London: J. Murray, 1920), pp.3-4.

¹⁴ 王柯：〈宗教共同體的邊界與民族國家的疆界：「回教工作」與侵略戰爭〉，載氏著：《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民族國家、邊疆與歷史觀

初已成了東亞各地穆斯林交流的重要基地。¹⁵ 舉例說，早於1907年7月，十一位中國穆斯林留學生在東京上野精養軒利用同教的「出使日本國大臣兼遊學生總監督」楊樞（1844-1917）提供的資金成立近代中國穆斯林首個民間組織「留東清真教育會」。該會章程第一條就以「聯絡同教情誼，提倡教育普及宗教改良為本旨」，當中宗教改革的味道與方向類於在北京辦學的著名穆斯林精英王寬（1848-1919）。數年內，來自中國十四個省的留日穆斯林學生已全數加入「留東清真教育會」（共三十六人，當中一人為女性，另有一人具阿訇資格）。¹⁶

在伊斯蘭世界，東亞的身影亦逐漸清晰。沙特阿拉伯在2016年公佈的改革計劃「沙特願景2030」（Saudi Vision 2030）確立三大目標，希望使產業多元而解決高度依賴國際油價的結構性經濟

識》（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頁193-229。

¹⁵ Hosaka Shuji 保坂俊司, "Japan and the Gulf: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Pre-Oil Relations," *Kyoto Bulletin of Islamic Area Studies*, 4-1&2 (March 2011), pp.3-24

¹⁶ 「留東清真教育會」對伊斯蘭教革新的觀點，基本上可說是以「愛國」與「救亡」。當中甚以有成員認為「同化」是中國穆斯林應行的觀點，其以為「何則種族之區別，不過內部自為畛域，其對於外界，毫無效力可言」。是以，當中國穆斯林（不止以華文為母語的穆斯林）作為「中國」（其實當時尚在大清帝國治下）的一份子，理當「皆注意於國是，漸忘種族之芥蒂，於是乎同化之功不期然而自至。」參王柯，〈「祖國」的發現與民族、宗教、傳統文化的再認識—中國穆斯林的五四與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八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96-209。王氏參考的《醒回篇》版本為東京1908年留東清真教育會所編，未知所藏何地。讀者亦可參考《清真大典》收「光緒三十三年（1907）日本東京秀光社刊本」與《回族典藏全書》收「戊申年（1908）留東清真教育會事務所鉛印本」，參留東清真教育會編輯社編，《醒回篇》，收《清真大典》（合肥：黃山書社，2005），卷24；留東清真教育會編輯社編，《醒回篇》，收《回族典藏全書》（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銀川市：寧夏人民出版社，2008），卷116。據筆者比對所得，兩版本並無重要差異。

問題，從而成為阿拉伯與伊斯蘭世界心臟、全球性投資強國、亞歐非樞紐。來自東亞的資金與技術，可說是計劃重點之一。在2019年末，沙國更將華語定為該國教育體系的第三語言。¹⁷ 據北歐聯合銀行（Nordea Bank AB）的數據，即使2019年寰球政治、經濟狀態不穩，日本、韓國及中國投資者均是印尼、巴基斯坦、馬來西亞及數個海灣國家的主要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來源。¹⁸ 在本世紀，東亞在二十世紀末以來累積的資本與生產技術，很可能會在伊斯蘭世界的經濟活動帶來重大影響。

自二十世紀的各項技術革新以來，人類的生活方式起了無以回頭的改變。2000年出現了第一部智慧型電話到2020年已能推出市場的5G技術，讓各種新形式的經濟活動得以可能，遠端醫療、家居工場、人工智能等，都使時間和空間大為壓縮。不同國家與文化背景之間的互動自必更為頻繁。因此，二十一世紀的文明交流將不會如十七世紀的早期全球化時代一樣，單為少數精英與國家壟斷；也因如此，文明間的衝突便如同經濟活動一般延伸至日常生活。伊斯蘭教與穆斯林在東亞、或是東亞投資者與移民在穆斯林國家的「能見度」提升既是機遇，也是誘發潛在衝突的危機。七十年代日本資金進入東南亞與過去數年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都是探討現代東亞文明與伊斯蘭文明文化衝突的重要

¹⁷ Hind Berji, “What’s really behind Saudi Arabia’s inclusion of Chinese as a third language?,” in *The New Arab*, January 29, 2020, accessed 4th May, 2020, <https://english.alaraby.co.uk/english/indepth/2020/1/29/saudi-arabias-inclusion-of-chinese-as-a-third-language>.

¹⁸ 參北歐聯合銀行 Nordea Trade Portal 網頁，<https://www.nordeatrade.com/en>，瀏覽於2020年5月4日。

案例；而自九世紀伊斯蘭文明播入東亞以來的各種協作與衝突，也自然值得現代人參考。

香港有利的地理位置及開放的學術環境，對伊斯蘭研究具天然的優勢。1970年代在香港大學擔任研究員的濱下武志曾在《香港大視野——亞洲網絡中心》提出香港曾經一時、面向四面八方、擁有八大腹地的海洋性格，當中超過一半的地域都有深厚的伊斯蘭教淵源。¹⁹ 雖然與不少地區相比，伊斯蘭研究在香港起步較遲，但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並與東亞各地穆斯林社會的友好與密切關係，都令我們認為伊斯蘭研究在香港日益急切，亦具深厚的發展潛力。為了推動伊斯蘭研究在香港的發展，伊斯蘭文化協會（香港）（Islamic Cultural Association-Hong Kong）與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Department of Cultural and Religious Studies）及人文學科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於2013年7月31日簽訂協議書，成立「伊斯蘭研究計劃」，以期促進伊斯蘭文化的教學與研究工作。自2013年以來，「計劃」舉辦了國際性研討會、邀請國際學人訪問及出版各類書籍，並於2015年5月12日，升格為伊斯蘭文化研究中心。在2020年，香港中文大學伊斯蘭文化研究中心、臺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香港政策研究所國際關係研究中心、Glocal Learning Offices、The GLOCAL合作，為推動華文學界在東亞伊斯蘭教的研究，決議推動「東亞

¹⁹ 所謂的八大腹地，包括一、沿海地帶：華南至華中；二、直接性腹地：廣東省南部至珠江三角洲；三、中國西南部：如貴州、雲南；四、東南亞北部，如泰國北部、老撾、越南等地；五、東南亞半島及其島嶼，如泰國南部；六、南海的海洋腹地；七、臺灣；八、日本、韓國、俄羅斯的西伯利亞與中國東北部。參濱下武志著；馬宋芝譯：《香港大視野——亞洲網絡中心》（香港：商務印書館，1997）。

伊斯蘭研究叢書」計劃，資助學界出版與東亞伊斯蘭教相關著作，回顧過去，關心當代，思索未來。

孔德維 博士

「東亞伊斯蘭研究叢書」總編
香港中文大學伊斯蘭文化研究中心

推薦序

香港作為國際都會，匯聚了世界各地文化。伊斯蘭文明在21世紀舉足輕重的一環，自然也在香港有相應的地位。在香港居住六年以來，我深切地體會到香港穆斯林群體的活力與熱情。但正如任何一個來源複雜多元的群體，香港伊斯蘭教的故事難以簡易述說，這就像一篇多線發展的長篇小說一樣，需要作者的才情與對故事的熱切喜愛。

霍揚揚博士以而立之年，為撰述香港伊斯蘭教的故事寫下重要一筆，可說是學界的一大喜事。書中所採納的史料，不少均係因霍博士「上窮碧落下黃泉」的努力，而首次得見天日。

「東亞伊斯蘭叢書」出版計劃是我任職的香港中文大學伊斯蘭文化研究中心志在向華文世界讀者闡述東亞伊斯蘭故事的十年計劃。立足香港，我們誠意盼望以深刻的香港伊斯蘭研究作品開拓這一系列。霍揚揚博士的作品可說完全滿足了我們的期待。

傅健士 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伊斯蘭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James D. Frankel

推薦序

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不同種族、宗教信仰、文化背景的移民在香港落地生根，大家在陌生環境之下，彼此互相尊重、包容，互相信任與體諒，造就了香港這一個多元文化的城市。穆斯林社群在香港的繁衍，正是香港多元文化共融的表徵。一直以來，有關香港穆斯林社群的研究，由人類學或社會學研究者主導，學者十分關注穆斯林社群的宗教生活，諸如守齋月、崇拜，以及風俗習慣，尤其是婚俗、葬俗等課題；而香港的普羅大眾對穆斯林社群的認識並不多，公眾對穆斯林社群的印象可能與實際的情況有異，不少人更誤以為香港穆斯林社群皆為南亞族裔，甚至不知道香港有一定數量的華人信奉伊斯蘭教，對華人穆斯林社群在港的發展，更是一無所知。華人穆斯林社群雖然從來都不是香港穆斯林社群的大多數，但他們自1997年回歸以後，開始在社會上受到重視，他們在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對香港整體穆斯林群體的影響，也日益重要。因此有關香港華人穆斯林社群如何在香港植根、求存、崛興，他們對宗教信仰的價值觀念，對傳統中國文化的取捨等，都是觀察香港穆斯林社群，乃至香港多元社會的特質，及宗教團體在1997年回歸以後的角色，解讀香港社會演變的關鍵。

2013年，霍揚揚參與香港中文大學的博群社區研究計劃，有機會服務香港少數族裔社群，深受啟發，開始積極關注穆斯林社群在香港的狀況，並取得香港華人穆斯林社群的信任，隨即啟動

了他對香港華人穆斯林的歷史研究。這本以華人穆斯林社群在地化為主題的著作，正是他的研究成果，也及時地彌補了目前研究不足的缺陷。這項研究徵引資料詳盡，所使用的珍貴原始材料，除了政府歷年出版的官方刊物外，更涵蓋了中華回教博愛社、香港中華回教青年會出版的刊物、華人穆斯林家族的族譜、伊斯蘭英文中學的出版物，作者並親身訪問了本地的華人穆斯林，邀請各被訪者現身說法，提供珍貴的一手材料，實在十分難得。研究從微觀的角度深入而全面地探討香港華人穆斯林社群在香港的發展歷程：包括了先輩的背景、在港定居的過程、宗教生活、子女教育、社會組織的建立與財務管理、宗教信仰的傳承等，鉅細無遺地逐一剖析，並描述了伊斯蘭社群如何在香港奮鬥的歷程，如何緊隨著香港社會經濟發展步伐邁步向前。研究更從宏觀的角度討論華人穆斯林社群與其他族裔的關係，在香港的政治角色，為相關的研究領域提供了新的素材，讓讀者對香港華人穆斯林社群的發展，有更深入的了解，是一本值得參考的作品。

香港華人穆斯林社群的發展狀況，不同的穆斯林社群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香港穆民與全球其他地區的穆民之間的相互關係，都是二十一世紀了解全球發展不容忽視的課題，希望霍揚揚能夠以此著作為基礎，今後就相關議題再作更深入的探討，為香港歷史研究作出更大的貢獻。

何佩然

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所長

2020年6月

推薦序

自古以來，世界各地不同族群的人們都會在不同環境、不同傳統、不同文化背景下創造出獨特的人類文明。宗教信仰往往會突破民族或區域的界限，能夠在全球範圍內獲得生存的空間與發展機遇。

伊斯蘭傳入中國，迄今已約一千三百餘年之久，開始於唐朝，鼎盛於元明，至清朝逐漸沒落。伊斯蘭教在中國發展至今，已經逐漸融入了中國社會，形成了以十個少數民族為載體的信奉伊斯蘭教的中國穆斯林群體。

香港做為國際化都市，隨著內地及海外穆斯林移居香港，逐漸形成了獨特的香港穆斯林社群，伊斯蘭得以在香港落地生根。來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也為香港帶來了豐富多元的伊斯蘭文化。

後輩學者霍揚揚博士，特別關注香港史的研究，尤其是對小眾宗教社群和族群在香港的歷史發展，以及香港與海外各地文化交融碰撞的發展。近年來他透過實地考察和口述歷史訪問的形式，對兩大香港華人穆斯林社群展開「在地化」的過程及其演變的研究。瞭解他們在融入香港主流社會生活的同時，如何努力嘗試在高度世俗化和商業化的香港社會中，保存伊斯蘭的傳統信仰和文化內涵。除此之外，香港華人穆斯林社群的社會參與度和政治影響力在近來也有逐漸增加的趨勢，與其他非華人穆斯林社群之間出現了影響力此消彼長的現象。

在他的研究報告中，他也嘗試點出了因應社會客觀條件的改變，在香港接受正統伊斯蘭教育的華人穆斯林數目正在減少，這使到香港華人穆斯林社群在宗教承傳方面漸漸出現了的「斷層」問題。

他在本專著中，也進一步探討了香港的華人穆斯林社群如何積極嘗試加深年輕華人穆斯林對其宗教身分的認同，以及當中所面對的機遇與挑戰。

本人與作者相識多年，年輕有為，勤奮好學，思維敏捷，善於探索。相信此專著的出版，不僅可以彌補香港穆斯林社群研究不足的現況，而且也會為推動香港社會關注少數族群的研究帶來深遠的影響。

宗教信仰做為一種文化現象的存在，是基於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總和，人們在逐步探索與研究的進程中，將會逐漸地豐富和發展，為人類社會留下具有歷史時代特色的文明印記。

楊興文 教長
伊斯蘭文化協會（香港）會長

自序

穆民

——香港華人穆斯林的聚合與離散

近年來，國際地緣政治的急劇變化使到伊斯蘭研究漸受到世界各地學者的注視。針對伊斯蘭政治變革、文化轉移乃至宗教身分認同的研究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然而，在筆者所身處的香港，社會大眾對於伊斯蘭的認識仍然相當片面，甚或仍存在不少誤解和成見。或許，很多香港市民對於伊斯蘭的認識還只停留在戴頭巾的印尼「姐姐」（家庭傭工）、南亞裔裔的保安員還有他們那些與主流社會不同的生活習慣，例如不能吃豬肉和每天都要向某個方向「拜神」（做禮拜）等。

伊斯蘭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宗教之一，全球穆斯林的數目數以十億計。伊斯蘭國家對國際政治和經濟局勢也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香港作為一個亞洲國際都會，一直以來都是一個文化大融爐。伊斯蘭早已在香港植根，融合在香港社會發展的脈絡中。但是，本地伊斯蘭研究一直以來得不到本地社會大眾和學術界足夠的關注。因此，筆者期望本書能為社會大眾開拓新的知識領域，加深他們對香港伊斯蘭和穆斯林的認識。

筆者尤其關注香港華人穆斯林的歷史和社群發展。很多香

港人提起穆斯林和伊斯蘭時只會想到中東、南亞和印尼等穆斯林人口大國，認為伊斯蘭與自己的日常生活沒有甚麼交雜，相距甚遠。很多人並不知道華人穆斯林的社群一直在香港存在，同在這片土地上經歷了百餘年的發展和演變。

香港華人穆斯林處於一個特殊而尷尬的位置。他們可算是「多數中的少數」：他們一方面是香港主流華人社會的一分子；另外一方面卻是本地少數信奉伊斯蘭的華人群體。他們具有華人血統和文化認同，同時也具有穆斯林的身分元素。這種多元身份認同的混雜性和流動性（hybridity）促使他們展現了獨特的社群面貌。

香港華人穆斯林社群的形成大體可上溯至十九世初末至二十世紀初。首批華人穆斯林從華南地區，例如廣州一帶南遷至香港。後來，中國內地在近現代爆發多次戰爭，來自不同省分的華人穆斯林在二次大戰和國共內戰前後，為逃避戰火而遷到香港。來自不同社會和經濟背景的華人穆斯林在香港展開了不同的「在地化」歷程，並在香港落地生根。

隨著香港的經濟自1970年代起高速發展，華人穆斯林社群的政治和經濟實力也不斷增加，本地華人穆斯林也日益積極參與本地的政治和社會事務。

然而，在這過程中，本地華人穆斯林社群的傳統宗教特色也無可避免地受到世俗文化的挑戰和衝擊，宗教承傳斷層的問題也日漸浮現。凡此種種都影響著華人穆斯林社群的生存空間及其長遠的發展。

本書以口述歷史訪談為經，一手歷史文獻資料為緯，探討本地華人穆斯林如何透過不同的方式和策略來融入香港主流社會的

同時，也竭力維持社群自身的宗教特色和身分認同。

本書能付梓出版實有賴各界先進的幫忙和支持。筆者在選材和組織史料方面曾面對了不少的困難，但在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何佩然教授的指導下，這些問題最終也應刃而解。在此我向她表示衷心的謝意。

此外，筆者也要特別感謝香港中文大學伊斯蘭文化研究中心各同仁對我的支持和幫助。他們協助筆者聯絡在港居住的穆斯林教胞，邀請他們參與口述歷史訪談和提供他們手上的一手史料。這些史料對這項研究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他們在本書準備出版期間，也提供了無數專業的意見和協助。

最後，我向那些曾為這項研究接受口述歷史訪談和提供史料的穆斯林教胞表達我誠摯的謝意。他們的投入和幫助使筆者獲益良多，也為我們的讀者開了一扇窗，讓他們能一睹香港華人穆斯林社群的精彩故事。

霍揚揚

2020年6月於香港中文大學